



邓小平如何办好《红星报》

□ 张秋实

《红星报》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，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军委机关报，由红军总政治部出版，于长征途中停刊。从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，邓小平担任《红星报》主编，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，他为办好我党我军早期的这份军报，倾尽全力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新闻报刊宣传工作经验。

“油印博士”重操旧业，展现宣传工作特长

邓小平从1923年开始，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便已显露出擅长宣传工作的才情。其时，他一边做杂工，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《少年》（后改名为《赤光》）杂志的编辑工作。因其蜡版刻字工整、印刷油印清晰、装订简雅结实而被大家称为“油印博士”。1933年5月，邓小平因遭受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，不久受命主编《红星报》，重操“油印博士”旧业。他充满热情和活力，展现出了革命家办军报的胸襟。

上任伊始，邓小平就与机关选派的3位办报人员一道，冒着酷暑，深入红军指战员中，搜集意见，听取建议，亲自组稿、采写、编辑、印刷、发行。经过多次调研，他决定改进报纸出版形式。首先恢复铅印，提高油印质量，增强阅读效果。其次活跃版面，请懂行作者设计栏目题图和尾花，为各类文章配上插图或漫画。至于文章标题，他有时亲自用美术字题写刊印。再次，增设广大红军指战员喜闻乐见的知识性栏目和文艺性副刊，将思想性与知识性、趣味性融于一体。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努力下，《红星报》以图文并茂的崭新形象出现在红军指战员面前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《红星报》的目标读者是广大红军指战员，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，文化程度不高。要让《红星报》充分发挥其宣传组织引导作用，首先必须让指战员们能够读得懂、感兴趣。为此，《红星报》除设有“社论”“要闻”等栏目外，还有反映政治思想理论建设的“党的生活”，反映红军生活的“红军家信”，介绍开展群众工作方法的“群众工作”，介绍军事战略战术的“军事常识”，介绍战场救护和防病治病的“卫生常识”等。此外，还在文艺副刊上开辟“山歌”“猜谜语”“趣味问答”，以生动有趣的内容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。

1949年5月进行的上海战役，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。面对国民党军以钢筋水泥子母碉堡群为特征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，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坚决贯彻中央指示，周密部署作战计划，经过艰难作战，最终取得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双胜利，把上海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，被誉为“战争的奇迹”。

“一个铜墙铁壁的城市”

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不久，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口号响彻了大江南北。为了守住上海，蒋介石亲自部署“保卫大上海”作战计划。1949年4月末5月初，蒋介石在上海复兴岛连续三批召集团级以上军官进行训话，要求国民党军坚守上海6个月至1年，“以待国际形势变化”。

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秉承蒋介石把上海建成“一个铜墙铁壁的城市”的旨意，于1月开始在上海构筑防御工事，5月上旬作战部署基本完成。上海战役开始前，国民党有守军20万，遍布市区内外的是40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、1万多座永久和半永久掩体碉堡、数万颗地雷。天上有机枪，海上有军舰，陆地上有装甲兵部队，汤恩伯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我们的大上海，要成为攻不破、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。”解放上海，已经迫在眉睫，再看看国民党军的防御工事和守备力量，要想解放上海，又谈何容易。

《红星报》编辑部与军委印刷厂相距三四华里。每期编好的稿件先要送到印刷厂，待工人排好后，再拿小样回来校对。邓小平校对极为认真，错漏之处很少。《红星报》丰富的内容、活泼的形式，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喜爱，被誉为“政治工作指导员”“红军战士的良师益友”。

注重通讯员强势阵容队伍建设，扩大政治影响

为了办好这份党的早期军报，邓小平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，广泛发动群众，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办法，组织起了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。他们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中的各级领导，也有基层连队的普通干部战士。其中，罗荣桓、肖华等红军将领都是积极写稿的通讯员。通过组建这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，《红星报》不仅保证了丰富的稿源，而且还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宣传骨干。

邓小平经常采用“红星号召”专栏，报道和反映红军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，以发挥《红星报》政治指导员的作用。每当有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发表，邓小平在仔细编辑修改后，总是再请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、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最后审定。他还经常约请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人为《红星报》起草社论，撰写文章。以署名看，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等都在《红星报》上发表过文章。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重要决策，也通过《红星报》迅速传播到广大红军官兵中间。

邓小平担任《红星报》主编时，正值南昌起义6周年，他决定在“红军故事”专栏中刊发一系列有影响的红军战斗故事以示纪念。于是，他主动向毛泽东约稿。毛泽东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，题目是《吉安의 占领》，并署上笔名“子任”。1933年8月14日，改版后的《红星报》第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。毛泽东生动形象地叙述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，表达了对当时“左”倾错误军事指挥的不满。毛泽东这篇文章不仅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，而且也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革命家办报的胆识和魄力。

团结鼓舞红军斗志，“红星”闪耀长征路

1934年10月，红军开始战略转移。邓小平带领《红星报》编辑部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长征。

每到宿营地，邓小平总是立刻铺开摊子忙碌起来。他们一边听取军委领导指示，一边搜集各军团战况，既采编稿件，又亲自动手写社论，还要刻板、油印，忙得不亦乐乎。10月20日，长征后仅十天，《红星报》长征专号第1期，就带着芬芳的墨香传到广大红军指战员手中。邓小平为这期报纸亲自撰写社论《突破敌人封锁线，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》，指出“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”，鼓舞着指战员前进的勇气和信心。

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问题很多，《红星报》以问题为导向，团结鼓舞红军斗志。比如，针对红军战士光脚行军问题，《红星报》在第2期上发表《怎样解决草鞋问题》的文章，大声疾呼红军各级领导要把解决战士行军穿鞋问题，提到减少病员、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高度来认识，并发动战士打草鞋。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，在很短时间内问题得到解决。再比如，红军进入粤湘境内后，由于不少战士缺乏防空知识，使敌机轰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。《红星报》立即组织编发《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》的文章，连夜刻印，使红军指战员较快地学会了防空知识和隐蔽办法，并采取对空射击措施，从而减少了人员伤亡。

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后，邓小平被突破乌江的英勇事迹所震撼，当即将在马灯下撰文翔实记述。全文写完时，已是6日拂晓，他便在文尾处写下“1935年1月6日”。由于战事吃紧，《红星报》一直没有时间出版。在遵义期间，邓小平加紧编辑制作，1月15日《红星报》1935年第1期终于出版，里面刊登了他在桐梓坡深夜写就的《伟大转折的开始——1935年的第一场胜利》一文。

遵义会议一结束，邓小平便在《红星报》上刊出了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，及时传达了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遵义会议的重要精神。遵义会议后，邓小平告别《红星报》编辑部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。在主编《红星报》70多期的工作过程中，邓小平倾注了大量心血，为办好这份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强军先强校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需要把院校建强建硬。人才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，有了充足管用的人才，军队建设方能完成从跟跑到领跑的一跃转型，未来战场上才能所向披靡。

努力提高精准办学能力

科学的定位决定发展方向和目标。加快军队院校建设转型升级，院校必须在全军院校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中，准确把握自身角色，找准自身位置，使人才培养走深走实。一是把人才需求标准搞精准。不同军兵种、不同类型部队、不同培养对象，对人才能力素质要求必然有所侧重。必须聚焦军队建设发展，在部队转型发展发展大势中，把准人才需求，实现院校人才培养与军队建设发展合拍共振；必须聚焦战争形态演变，针对未来可能在哪打仗、与谁打仗、怎样打仗，把握人才需求，实现院校人才培养与使命任务高度契合。二是把办学定位搞精准。我军院校多层次、多类型、多专业的办学育人格局，要求每个院校必须把自身的办学定位搞清楚。搞清办学的类型定位，如综合型、专业型、技术类；搞清办学的功能定位，如军事人才、政治人才、保障人才等；搞清办学的特色定位，就是院校的优势和与众不同之处。三是把培养目标定位搞精准。院校需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，制定“共同+特长”的人才培养目标。合格，是军事人才培养要共同达到的目标，是基本要求；特长，是院校针对部队类型和任务特点，对人才实施的个性化培养。

努力提高院校长办学治校能力

推动院校建设加快转型升级，第一位的是必须打造一流院校长队伍，让他们担当起为育人的时代重任。一是院校长需要选准配强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，毛泽东就说过：“要办好一所学校，第一件事就是选好校长。”军事院校的特殊性，要求院校长既是育人大师，更是领兵打仗的将才。信息智能交融的时代，战争形态加速演变、战争制胜机理深刻变化，作战方式方法持续翻新，办学育人如何适应战争新形态、新特点、新要求，对院校长素质提出了时代考验。院校长不是战略大师、不熟知现代战争特点规律、不是打仗型人才，就建不出一流院校、打造不出一流师资、培育不出一流人才。二是重视院校长的培养。院校长处在办学治校第一线，肩负重要职责，面对风起云涌的世界新军事革命，不及时更新知识、更新技术，就可能会进入“知

识半衰期”，很快被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淘汰。必须转变思想认识，让院校长培训、交流、研讨、考察成为常态，在走出去、请进来中，实现他们视野、知识、能力与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合拍共振；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，让他们第一时间接受新知识新技术，完成观念、思维、知识更迭升级。三是院校长队伍建设也需要引入竞争机制。院校长应该建立末位淘汰以及提前退出岗位等机制，让这支队伍劲头满满、生机盎然。同时，更应打通院校长与部队交流渠道，通过院校长到部队代职、任职，然后再回院校的方式，让他们在思想上连军事变革大事，下触部队演兵场，使其既可观战战争风云，又可脚踏大地办育人。

努力提高师资队伍教研能力

师资队伍建设，既是院校建设的重中之重，更决定人才培养质量。一是让师资队伍有很强的吸引力。目前，我军院校建设势头良好，但也存在吸引力不足的问题。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台法规政策，进一步浓厚崇尚尚武社会氛围，真正把军队打造成为热血青年实现梦想、展示才华的优先考虑；需要将院校置于军队优先建设发展的位置，把最优秀的人才、最先进的装备器材配发到院校；需要完善院校建设配套制度，在人才素质标准、教学科研质量管控、教育管理运行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，从制度机制上解决院校建设面临的矛盾问题。二是让师资队伍流动起来。一方面，院校教员方便“走出去”。需要打通院校人才对外交流的渠道，让优秀人才有进步的大空间、大舞台。另一方面，部队人才方便“走进来”。院校干部与部队干部“两潭水”“两座山”，使师资队伍离部队越来越远、离战场越来越远，而部队干部由于整日奔忙于管理训练，对新知识新技术也日渐生疏。美国、土耳其等一些国家军队，作战部队与军事院校每三年一次军官大交流，盘活了人才资源，让人才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。需要从政策制度上进一步拓展渠道，彻底走开院校与部队人才交流的路子。

努力提高教学保障能力

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，推动院校建设加快转型升级，必须让课堂对接战场、教学对接打仗，通过校园近似实战的教学训练环境，磨砺学员适应未来战争所需要的品质、能力和素质。一是最好的资源给院校。军事教育，是着眼明天、面向战场的事业。只有将最好的资

加快军队院校建设转型升级

□ 王雪平

源优先、足量给院校，学员能力素质才能在近似实战的环境条件下生成。需要转变理念，将最前沿的技术、最先进的教学设施器材、最新的武器装备第一时间给院校，实现人才超前培养。二是打造“小战场”。一些院校的教学设施、训练场地，仍滞留在教室宽敞明亮、训练场地广阔的层面，与“校门对接校门、课堂连战场”的要求相去甚远。院校急需打造模拟仿真教学环境，让学员在高度仿真未来战场情景中练指挥、练战法、练谋略；急需建设能与未来战争相匹配的演训场，让学员适应战场、指挥打仗的能力素质在预战场练就。三是驻地教学训练资源共享。让地域教学训练资源最大化共享，应该是未来提高教学保障质效的重要抓手和发展方向。要通过政策机制，成立组织协调机构，努力把地域教学训练资源盘活起来，实现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；加强驻地多单位的联研、联教、联训、联演，既解决资源共享共用的问题，也让人才的联合意识、联合能力得到锻炼。

军事理论

解放上海为何被誉为“战争的奇迹”

□ 王 振



为了不惊扰市民，露宿街头，解放上海的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，

日，解放军第29军奉命向月浦发起进攻，经过两昼夜鏖战，于15日拂晓攻占月浦老街。国民党守军除部分从水路逃走外，剩余兵力收缩钻进了“瓷器店”里，企图借有利位置坚守。

攻打市区“一概不用重武器”

5月23日夜间三野发起全线总攻，分别从东、南、西三面攻打市区。为把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，三野下令：攻打市区只准使用轻武器作战，一律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。

在攻打邮电大楼时，敌人在楼顶制高点上不停扫射，不少战士在国民党的枪炮声中一个个倒下。此时的27军肩负攻城重任，军长聂凤智牢记陈毅的嘱托：一定要军政全胜！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低至最低限度！他心里明白，一旦这些建筑回到人民手中，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，而是成为了人民的财产，这才是“战上海的大义”。

解放军战士坚决执行上级命令，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上海人民的支持下，使用步兵轻武器，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歼灭敌人，用实际行动奏出了一曲曲“听党指挥、纪律严明、不怕牺牲”的英雄赞歌。目睹了当年战斗的上海百姓

回忆：“解放军战士一批一批倒下又一批一批往前冲，苏州河水都被染成了红色。”5月25日清晨，南京路上永安公司大楼的最高处“绮云阁”，一面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。27日下午，杨树浦发电厂、自来水厂守敌缴械投降，上海市区宣告全部解放。在炮火连天、硝烟弥漫的剧烈战斗中，电厂照常供电，水厂照常供水，电话局照常工作，城市没有遭到大的毁坏，“瓷器店”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。苏联战地摄影师拍摄的解放军攻打邮电大楼的片子里描写道：“在此战役中，邮政大楼内没有丢失一件邮件，没有损失一件设备，没有遗失一份档案，可谓是一个战争的奇迹。”

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再“野”

在渡江战役之前，三野就制定了《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》。当中央收到陈毅关于“入城守则”的草案后，毛泽东很快就在来电上批复了8个大字——“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”对于不准开炮、不搞爆破、不使用重武器，部队坚决执行，而对于“入城守则”规定的“不入民宅”这一条，战士们有不同想法：“过去打仗，哪次不是住老百姓家里，上门板掀稻草，挑水扫院子，哪点

做得不好？难道上海不是咱中国地盘？”“战士生了病，进房要点开水喝也不行？”不理解的声音不时发出，陈毅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，是我们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。见面礼搞不好，是要被人赶出来的。野战军，到了城里不准再‘野’，纪律一定要严！”对于“不入民宅”这条，陈毅要求各级干部下保证书，无条件坚决执行。即便有个别干部战士不够理解，部队也都模范地执行了入城守则。

上海市民推门出门看到的是，在自己家门口，成排的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露宿街头。上海老百姓们感到稀奇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本色的军队，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，攻入城市，打了胜仗，却坚持“进城不扰民”，占领了一个城市，下雨天居然不入民宅，就这么睡在潮湿的马路上。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，三野规定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，甚至部队吃的饭菜，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，再送到市区。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刘靖基回忆当年的情景时激动地说：“几十年来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，真是出乎意料。”霎时间，香港和国外媒体上，醒目地出现了解放军露宿十里洋场街头的照片，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、文明之师的形象名扬世界。正如美国《生活》杂志所说：“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。”

军事历史